

## 研究論文

考古人類學刊・第 96 期・頁 1-40・2022

DOI: 10.6152/jaa.202206\_(96).0001

# 行動中的鄉民：冷戰脈絡下應用人類學的外一章

褚縈瑩\*

## 摘要

論及美國人類學知識在冷戰期間扮演的角色，研究者通常著眼於人類學者如何協助政府蒐集情報，或者參與在美方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各類現代化計畫當中，批判人類學者如何服務於冷戰，進一步衍生出人類學研究倫理問題。本文將以冷戰期間著名的應用人類學計畫——康乃爾—秘魯計畫為例：首先，脈絡化鄉民研究如何作為冷戰知識體系當中重要的一環，形構出守舊的鄉民／革命的鄉民兩種形象。其次，本文將論證，並非位在冷戰前線的秘魯，事實上在此應用人類學計畫過程中，允許一種跳脫冷戰對立框架的鄉民特質浮現的空間。本文預計以該計畫執行人類學者 Mario C.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為核心史料，分析他筆下呈現出來一種具備歷史動態的鄉民形象，超越了當時人類學知識解釋文化變遷、界定鄉民性質的理論框架。康乃爾—秘魯計畫起初因服務於冷戰下的現代化推廣需求而生，但在計畫的操作過程中，卻非預期性地產生出新知識的潛質。

關鍵詞：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鄉民研究，康乃爾—秘魯計畫，馬里奧·瓦茲克斯

---

\* 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yychu712@mail.ntpu.edu.tw](mailto:yychu712@mail.ntpu.edu.tw)。

## **Peasants in Action: Revisiting Cornell-Peru Project against Cold War Context**

**Ying-ying Chu\***

### **ABSTRACT**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S. anthropology and the Cold War, previous studies have generally focused on how some anthropologists have helped the U.S. government collect war intelligence or facilitated modernization projects with their local knowledge. Looking back into this dark side of their history, anthropologists are cautious about their past services to the Cold War. This often leads to ethical discussions. This article studies an applied anthropological project against the Cold War context, namely, the Cornell-Peru Project at Vicos, not for an ethical but rather for a historical purpose. The fieldnotes of a Peruvian applied anthropologist, Mario C. Vázquez, are used to show how he actually developed an image of peasants in action, transcending the opposing views of conservative vs. revolutionary peasants at the time. More importantly, this body of practical knowledge did not develop out of classical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but rather through interactive processes and the daily practices of Vázquez and the Vicosinos. Vázquez's fieldnotes challenge our view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eldwork, fieldnotes,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Keywords:** applied anthropology, action anthropology, peasant studies, Cornell-Peru Project at Vicos, Mario C. Vázquez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Email: [yychu712@mail.ntpu.edu.tw](mailto:yychu712@mail.ntpu.edu.tw).

## 一、前言

本文是關於人類學史當中一塊微小、鮮少被提及，但卻具備了突破性的碎片。本文的主人翁 Mario C. Vázquez 是一位秘魯籍的人類學者，無論是在秘魯國內或者是國際人類學領域，他並未累積豐厚的學術資本——他的學術發表量少、他生前並未服務於大學或研究機構，也不是各式學術研討會的常客。若要發掘他的學術足跡，大部分來自於他曾參與美國人類學史當中一個知名的應用人類學計畫——位於維科斯莊園的康乃爾—秘魯計畫（Cornell-Peru Project at Vicos）。

當時 Vázquez 仍是就讀於秘魯國立聖馬可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民族學院的學生，他在計畫中扮演常駐維科斯莊園的重要角色，相較於只在長假期間來來去去的美國教授與研究生，Vázquez 更有機會於 1949 至 1951 年間，對大莊園進行完整研究。「[...]是 Vázquez 博士對於當地人及其文化形式的熟稔，使得這個資訊蒐集工作得以順利進行」（Foster 1969: 31）。正如 George Foster（1969）所言，Vázquez 經常被憶為是該計畫能夠順利進行的關鍵之一；但是大概不會有人說 Vázquez 對於人類學理論有什麼貢獻，而理論貢獻通常是人類學史關注的焦點所在。

本文以 Mario C. Vázquez 在計畫期間用打字機所整理的田野筆記為主要材料，分析這些從未公開發表的筆記內容，並說明它們如何呈現出當地人作為一種「行動中的鄉民」的形象，事實上已經超越了後來鄉民研究中「保守的鄉民」對照於「革命的鄉民」這兩大類形象，而產生了一種新的知識性質。Vázquez 在國際冷戰局勢下，及秘魯本身農業改革浪潮中，面對農村議題，透過一邊行動、一邊思考，打造出一條路徑。這條路徑雖然讓他得以對於社會文化變遷產生一種新的理解，但並不是回饋到他的學術書寫當中，因此精確來說不是一種「理論貢獻」；而是回饋到他評估未來行動的具體執行方案上。它不是關於將現象抽象化、變成理論的知識，而是關於「怎麼做」的知識。

其次，本文想要強調的是，如果我們將人類學者也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本身（而不僅只是一個外於研究對象的觀察者），檢視他所遺留下來的各式史料（而不僅只是他的學術發表），以及他在應用人類學計畫中與當地人的互動，我們可以重新評價冷戰脈絡底下，應用人類學與行動人類學在人類學史中的位置。

更具體來說，應用人類學通常被視為將「理論」拿去「應用」而無法回過頭來貢獻理論發展的取徑；而行動人類學雖有創建理論的企圖，但經常被視為在福克斯計畫（Fox Project）後未再有成功案例；因此在以理論典範轉移為主軸的人類學史當中，應用人類

學與行動人類學充其量只能算是岔出去的故事支線，應用人類學甚至因為服務於冷戰需求而可能產生倫理問題。然而，我們可以從 Mario C.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中，讀到他描述莊園鄉民如何考慮周遭條件並做出改變的種種細節，它能夠豐富我們對於冷戰時期人類學史的圖像。

在第二個層次上，本文想進一步回應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書寫人類學作為一個學科的歷史？當歷史學走過了社會史與文化史的轉向，小人物、日常生活，甚至是物件本身，都已經是歷史研究的適切主題時；社會科學史，在本文中特別是指人類學史，是否能夠透過重新檢視一些，以往我們認為對學科發展沒有太大影響與貢獻的小人物、故事支線，豐富我們對人類學整體的認識？本文要談的是一種，將人類學者視為歷史行動者，將他們的研究與行動放回歷史動態中檢視的取徑。

本文第二節將回顧冷戰時期人類學史及社會科學史等相關研究，作為本文主要對話對象；第三節則說明二戰後的美國人類學界，為什麼開始關注「鄉民如何進行文化變遷」的問題，並梳理此議題與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的關係，為本文案例提供一個歷史舞臺；接著再進入本文的案例研究——康乃爾—秘魯計畫，以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為主要分析材料，討論筆記如何呈現「行動中的鄉民」。

## 二、文獻回顧——冷戰時期的美國社會科學

在人類學界，探討冷戰脈絡如何影響美國人類學的發展，可以分為三種不同的書寫方式。第一種是將人類學史等同於社會文化變遷理論演進史，在這類型的歷史編纂中，敘事經常聚焦在概念與重要學者的轉換，且只有對於理論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才會被挑選出來。如同 Dustin Wax (2008) 所批判，這種學科史的書寫方式失去了具體的冷戰歷史脈絡，包括制度上如學院體制、資金來源，思潮上如區域研究、現代化理論、發展理論等，如何引導知識的發展方向。

第二種類型的書寫正是對上述批判的一種回應，並以 David Price 的一系列作品 (2001, 2002a, 2002b, 2004, 2005, 2007, 2008, 2011, 2016) 最具代表性。Price 的作品以梳理美國聯邦調查局 (Peace and Price 2001) 與中央情報局歷史檔案見長，他將人類學界比喻為一個部落，而人類學者就是其中的土著，土著是很難意識到，自己的世界是如何由經濟所決定的 (Price 2011)。他所謂的「經濟」指的就是冷戰期間來自軍方與政府、透過各式民間基金會分配的研究經費。David Price 透過研究機構組織、資金來源與人際

網絡，說明人類學者如何受到其所處的歷史脈絡影響，在冷戰中成為被動遭到動員的一分子。

Price 對於這段歷史採取一種批判性的立場，他的核心關懷仍然圍繞人類學研究的倫理與政治之上，特別是回應美國近年在中東地區以反恐怖主義為名的戰爭，積極徵召人類學者加入的現象。冷戰期間的人類學史在他筆下，是一面照亮今日的明鏡。我認同這是人類學界不可或缺的一種聲音，但這也某種程度上讓冷戰期間的人類學者經驗變得扁平，僅有主動或被動加入或者對抗體制的兩種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我以為上述兩種書寫人類學史的取徑，背後對於人類學者都有著期待，前者的期待是人類學者都致力於發展更好的社會文化變遷理論，這也是我們認識這個學科最好的方式；後者則期待人類學者須遵守其倫理守則，不可對研究對象造成傷害。我以為這都是將學科歷史的編纂與閱讀，當作一種學科內的價值塑造與傳承的工作，也就是透過人類學史，一再提醒學者們，這個學科對於理論貢獻與研究倫理的重視。這是本文想要跳脫的歷史編纂價值觀，以下我會借用歷史學者對於冷戰期間美國社會科學的研究，引出人類學史的第三種書寫方式，這也是本文欲採取的取徑。

相對於上述兩種方式，歷史學者對於冷戰期間社會科學史的研究，核心關懷則在於如何恢復歷史動態、行動者的歷史能動性這一點上。包括 Nick Cullather (2000, 2004)、David Engerman (2003, 2007)、David Engerman ed. (2003)、Nils Gilman (2003)、Joel Issac (2007)、Michael Latham (2000) 的作品，都更為強調，美國政府官方的冷戰政策並未全盤決定當時社會科學的樣貌，學者即便使用軍方或政府經費，也不見得會做出冷戰需求導向的研究成果，甚至反而會挑戰政府對外政策，衍生出豐碩的研究成果。Joel Issac (2007) 更呼籲歷史學者應避免停留在「冷戰社會科學」這樣全面性的大標籤上，並進行更多的「中程脈絡化」(middle-range contextualization) 工作。

這與人類學史家 George Stocking (2000, 2010) 的呼籲不謀而合，他主張，冷戰時期的人類學史，應該納入更多在「智識層次、倫理層次、意識形態層次與行動層次上，有不同信奉對象、在不同軌道上行進的分歧經驗」(Stocking 2000: 253)；而不只是停留在批判服務於冷戰政策之假科學這個層次。本文重新梳理的康乃爾—秘魯計畫，最初或許是基於冷戰的需求而發，但在其中所呈現的鄉民樣貌，卻已經跳脫了保守與革命的兩種極端形象，而人類學家 Vázquez 更在過程中發展出一種關於「如何做」的知識類型，更豐富我們對於冷戰時期人類學史的理解。

### 三、二戰後的美國人類學舞臺：文化變遷、鄉民研究與應用人類學

提及二戰後的美國人類學時，人類學史的主流敘事，經常是以 Leslie White 的新演化論與 Julian Steward 的文化生態學為主，闡述他們對於鮑亞士學派長期以來主宰了美國人類學界的反省與突破。來自新演化論與文化生態學的挑戰，無疑如同主流人類學史或教科書所呈現，是一種理論上的突破，同時也是學術界內的世代交替。部分人類學史或許還會觸及，由 Steward 所主持、其學生 Eric Wolf 及 Sidney Mintz 等所執行的波多黎各計畫（The Puerto Rico Project），如何與 Robert Redfield 的「都市—鄉村連續體」模型對話，構成了 1950 年代起鄉民研究（peasant studies）的基礎。

但我們通常都還是將這些新的發展，視為人類學內部對自身知識領域的反省與創新，也因此我們鮮少將上述發展與同一時期的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相提並論。事實上如果我們去檢視當中的人際、經費與機構的網絡，將會發現鄉民研究、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三者並不是各自獨立存在的現象，它們有諸多交織的節點。比較精確來說，是同一個歷史脈絡下，不同學者在經過嘗試與思考過後，最後所選擇的面對當前世界的不同取徑。

在本節，筆者試圖將上述三個取徑一同回顧，但並不是全面性地重新梳理它們各自的發展，而是呈現三者如何與當時一個核心問題密切相關——處於原始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的這群人，有什麼特質？其文化變遷如何可能？這個核心問題不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好奇與追求，也關係到更大的冷戰背景下，美國考慮如何將其民主與發展經驗輸出的焦慮感。

#### （一）墨西哥與鄉民研究

鄉民研究在美國人類學的脈絡下，與這個學科對於拉丁美洲的「複雜社會」產生興趣有關。在此之前人類學傾向研究小規模社會，大約從戰間期（1919-1938 年）起，美國人類學者就開始了對拉丁美洲的研究，並特別聚焦在墨西哥、瓜地馬拉、波多黎各三個區域。筆者將在下文依序介紹，鄉民研究早期的重要作品，如何奠基在這三個區域的研究之上。

墨西哥的人類學傳統帶有強烈的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o）傾向，也就是在拉丁美洲有原住民占人口多數的國家，所發展出一種將原住民文化揉雜進入二十世紀官方國族

論述、以標誌與歐洲不同之處的思想。原住民主義經常一方面歌頌拉丁美洲古文明的榮光，另一方面哀嘆當代原住民的墮落與貧窮落後處境，從而形成社會改革計畫。墨西哥現代人類學的重要領航學者 Manuel Gamio，就是一位著名的原住民主義者(indigenista)，他曾在鮑亞士的門下學習，回國後更為墨西哥與美國人類學界牽起學術研究上的聯繫，因而這些初始的研究也是關注這群歷經長年殖民、已經不再原始的原住民，究竟會如何現代化的問題。

Robert Redfield 的「都市—鄉村連續體」模型，可說是為人類學研究「鄉民」這個範疇立下了正當性，但同時這個模型也是學者們對話、批判的指標。Redfield 發展此模型，是基於他從 1926 年起，於墨西哥 Tepoztlán 的研究，該鎮距離首都墨西哥市 (Mexico City) 約 75 公里。Redfield 主張我們如果以一個抽象的「都市—鄉村連續體」框架來看，就會發現在所謂的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之間，存在著都市化程度不一、位在光譜上不同位置的鄉民社會，越接近都市化的鄉民社會，則越可能呈現個體化、世俗化、失序化等傾向 (Hewitt de Alcántara 1984)。

George Foster 則以他在墨西哥 Tzintzuntzan 的研究，發展出著名的「幸福有限論」(image of limited good)，批評即便是處在 Redfield 連續模型最傳統那一端的鄉民社會，人們也不是集體化、神聖化、有秩序的，反而發展出一種幸福有限、因此每個家戶都必須與他人競爭，以盡可能分得最大一塊餅的心態及行為 (Foster 1965)。Oscar Lewis 更是直接重訪 Redfield 的田野地 Tepoztlán，描繪了一幅與 Redfield 完全不同的圖像 (Lewis 1951)，並且進一步發展出著名的「貧窮文化」概念 (Lewis 1959)。

包括 Foster 與 Lewis 在內，學界對於 Redfield 的連續體模型的批判，其實圍繞著一個主題——「鄉民」此一概念所指稱的人群範圍，在文化上究竟具備哪些共通的特性？在什麼情況下會產生文化變遷？例如 Foster 對於 Redfield 的批評，主要就是質疑鄉民是否具有互惠合作的性質，而他所觀察到的「有限幸福論」這一心理機制又如何限制鄉民採納新事物。至於 Lewis 著名的「貧窮文化」概念 (Lewis 1959)，一方面反對 Redfield 去歷史的抽象模型，另一方面他也不甚同意 Foster 心理學式的詮釋。Lewis 的貧窮文化雖然經常被誤解為與 Foster 類似、強調資源有限條件下人類行為特質、加強了對於貧窮者的刻板印象；然而 Lewis 並不停留在譴責受害者 (blame the victim) 的層次，他認為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接合才是這些「病徵」形成的主因，所謂的貧窮文化只是在幫助這些人適應現代化過程，而不是 Foster 所說「阻礙」了現代化的一種保守心態。

鄉民研究就是圍繞著上述問題，而逐漸於 1950 年代形成的一個研究領域。誠如 Eric

Ross (2011) 指出，是冷戰這個新需求，使得人類學者必須考慮鄉民社會及現代化的關聯性，而不能只是透過“folk culture”的概念，來理解介於現代與原始社會之間的這一群人。在冷戰這個新框架底下，這一群人的動向備受關注，他們的性質為何？在何種情況下會逐步融入現代社會？或者起而革命？Redfield 以降的鄉民研究，讓冷戰的知識架構，具備抽象理論和具體案例研究，去處理一群可能參與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的潛在盟友——「鄉民」。

## (二) 波多黎各計畫：從文化生態學到政治經濟史

Julian Steward 所主持的波多黎各計畫，也有著與 Redfield 的概念對話的企圖。以整個島嶼作為研究的尺度，Steward 設計讓學生進入不同的社群研究，依照他文化生態學的理论架構，每個小社群都是更大的自然環境與社會脈絡的一部分。波多黎各計畫的選址與規劃，不只是依照 Steward 的文化生態學理論而行，也與美國輸出新政 (New Deal) 以來的發展經驗密切相關。

波多黎各自 1898 年起成為美國領土的一部分，並且特別是在二戰後的 1945-1965 年間，成為美國社會科學進行研究與實踐的社會實驗室 (Lapp 1995)。這與 1942-1946 年間由小羅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總統所指派的波多黎各總督 Rexford Tugwell 有密切關係。Tugwell 原就是小羅斯福新政的智囊團成員之一，而新政恐怕是美國史上首次由政府強調社會科學專業知識可效力於社會福祉的時刻。Tugwell 卸任後，與美國學術界的聯繫工作移交至波多黎各大學，該大學持續以經費支持美國社會科學學者至波多黎各研究，Steward 所主持的波多黎各計畫就是誕生在這個脈絡下。

不過雖然計畫由波多黎各大學支持，Steward 其實並不贊同該大學當時欲以社會科學研究打造波多黎各國族主義，因此強調島內各社群在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現代化的傾向 (Lapp 1995)。計畫最終產出的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一書 (1956)，認為島上具備了多樣的次文化體系，因此當時該書在波多黎各的社會科學界並未受到好評。

Steward 本人並沒有實際進行該計畫的田野工作，而是由他的學生進行，當中最為人熟知的恐怕就是 Eric Wolf 與 Sidney Mintz 兩位，而他們最終完成的研究成果事實上也超越了文化生態學的架構，而更傾向是一部關於波多黎各的政治經濟史 (Silverman 2011)。波多黎各計畫當中所描繪的「鄉民」，自此擺脫了 Redfield 那種去歷史的抽象性質，也與 Foster 所暗示的心理學取向逐漸分道揚鑣，步上結合文化生態學與馬克思主

義式政治經濟學的詮釋 (Wolf 1966)，並繼續追問鄉民是否如同工人階級一般具備革命的潛質 (Hobsbawm 1971[1959]; Wolf 1969)。

### (三) Sol Tax 的瓜地馬拉研究與行動人類學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看到，關於鄉民的特質，出現了保守與革命的兩種形象；第三種形象——具備文化韌性的鄉民——則在 Sol Tax 於瓜地馬拉的案例研究中浮現 (Tax 1953)，並成為奪得 197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 Theodore Schultz 發展其理論的重要材料來源之一 (Schultz 1964)。Sol Tax 所著 *Penny Capitalism* 一書中的 Panajachel 鄉民，跳脫了上述保守或革命的兩個極端，他們具備文化韌性，「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就如同我們一樣」 (Tax 1975)。

Tax 在瓜地馬拉 Panajachel 的田野，事實上也與 Robert Redfield 密不可分，Tax 當時仍在芝加哥哥大人類系書寫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就受到老師 Redfield 雇用為計畫研究人員，赴瓜地馬拉，為華盛頓卡內基研究所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的歷史研究部門，調查當代馬雅民族學，田野調查期間 (1934-1940 年) 他們也一直保持書信往來 (Rubinstein 2002[1991])。Redfield 原本期待 Tax 能夠協助他測試「都市—鄉村連續體」的理論框架，但是從兩人在 1935 年 3-4 月之間的信件往來可以看出，Tax 並不同意這個理論框架能夠用來理解眼前的現象 (ibid.)。

在此田野研究的第五階段——1938 年 10 月至 1939 年 4 月間，Tax 應邀寫了一篇關於 Panajachel 經濟生活的文章，頗受好評；他決定將文章規模擴張，寫成後來的 *Penny Capitalism* 一書。過程當中，Redfield 都抱持著支持 Tax 的態度，即使 Tax 所發展出來的鄉民圖像，與他的模型可能是互斥的。Tax 也很明白地在信件中回覆 Redfield，相較於 Redfield 之前所建議，研究現今馬雅文化當中，哪些層次是在殖民之前就存在、哪些是受到西班牙人的影響，他覺得自己找到了更有興趣、更值得發展的主題 (ibid.)。

Tax 對於鄉民具備文化韌性這個看法，其實與他所發展的行動人類學 (action anthropology) 綱領中，對北美原住民的認識 (Tax 1975) 是相當接近的。1950 年代早期，美國社會普遍存在一種「原住民早已消失殆盡」的迷思，因而浮現所謂的北美原住民終結論，意味著政府將不需再以聯邦資源維持原住民作為一種法律實體的存在意義。當人們發現原住民保留地內依然存在原住民時，遷置這個政策方向依然是主流思維。在文化大熔爐 (melting pot) 的概念尚存一息的時代，美國人類學會對此發出聲明，主張

原住民是能夠接受同化的，籲請政府放棄終結論及遷置政策。Tax 自陳他當時並未意識到學會的同化觀點有此種政治意涵，他憶道當時連原住民自己都認為同化終究無可避免。

在這樣的氛圍中，Tax 獨排眾議地主張，北美原住民的文化依然存在，而且是以一種具備韌性的狀態存在 (Tax 1988)。他所提倡的行動人類學，並不是指人類學者進入被研究者的社會帶領或開啟行動，而是在共同行動的過程中，去理解人們在面對變遷時，是如何琢磨手邊可得的各種選擇，而後行動 (Tax 1975)。如此一來，他主張行動人類學亦有別於應用人類學 (applied anthropology)，它並不是將已經發展完成的理論拿去應用，而是在行動過程中發展人類學關於文化變遷的理論。

Tax 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期間所領導的福克斯計畫 (The Fox Project)，恐怕是行動人類學唯一較為人所知的案例。行動人類學並沒有在人類學史中留下太多痕跡，Robert Rubinstein 認為這是因為行動人類學在知識生產上所需的時間——從研究計畫書寫、資金補助核銷，到最終的研究成果發表——難以配合學院體制的時間框架所導致。在教學上，行動人類學也難以呼應大學的學期制，將行動限縮在學期之內完成 (Rubinstein 1986, 2018)。換言之，行動人類學在追求理論訓練與理論貢獻的主流學院體制內，是沒有錢也沒有人的一個取徑。即便有學生願意將自己的職涯立基於行動人類學之上，Rubinstein 的觀察是，他們經常被指導老師或者求職單位拒絕，致使行動人類學無法在學院內自我再生產 (self-reproduction)。

Rubinstein 似乎暗示了行動人類學是被主流人類學排除在外的；但另一方面，如同 John Bennett 提出，Sol Tax 本身就是位具叛逆性格的學者，他將行動人類學與其他既存理論取向都劃清界線的同時，可能也錯失了以更為系統化的理論工具研究社會行為的機會 (Bennett 1996)。例如，Tax 極力劃清他與應用人類學的界線這點，筆者認為的確可能掩蓋了，當時行動人類學與應用人類學面對類似挑戰——亦即企圖與文化變遷理論對話、但並未成功的事實。

的確，行動人類學是比應用人類學更有理論企圖 (Rubinstein 1986)，而當時的應用人類學也的確是比行動人類學採取了更為家父長制的態度 (Bennett 1996)，它們是人類學史中兩個不同的發展方向。然而正如本文企圖以 Mario C.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呈現，他在應用人類學田野中的行動、思考與記錄，事實上已經超越了這種二分，回應了行動人類學所提出來的問題。

早在 1957 年的美國人類學年會中，Lisa Peattie (Redfield 的女兒) 就已經指出應用人類學最能夠貢獻的就是關於過程與文化變遷之理論，但以當時應用人類學所累積的成果來說，多半還處在描述性資料的階段，需要更進一步的理論化 (Peattie 1958)。John Bennett 在 1996 年的回顧中又再次提到了這一點，也就是應用人類學事實上累積了許多關於文化變遷的細緻材料，但由於 (1) 這些材料並未能以抽象理論模型的型態呈現；(2) 1950 年代人類學的理论關懷仍然是文化的精髓，而不是變遷，所以主流人類學界並未關注這些累積 (Bennett 1996)。Bennett 的批判也讓我們意識到，人類學知識長期存在的一個內在矛盾——儘管人類學者一直以來都面向田野中的文化變遷現象，然而至少在實踐論轉向以前，學者都更傾向尋找文化中恆常穩定的部分——而這也影響了我們如何擺放應用人類學在學科史中的位置。

筆者認為 Peattie 與 Bennett 所指出的並不單純只是應用人類學缺乏理論化的現象，更是有大量具備理論化潛力卻尚未受到分析的材料。如同 Peattie 所言，如果要理論化應用人類學過程當中的文化變遷，我們勢必要將應用人類學者本身放回分析框架當中，因為他們也是這個變遷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變項 (Peattie 1958)。但過去恐怕是因為應用人類學者多半還是將自己置身於他所觀察的變遷過程外，因此並不會將人類學者本身當作應分析的變項之一。但事實上，文化變遷是一複雜且牽涉到非正式影響與選擇的過程，應用人類學者的報告或研究成果出版，如同 Bennett (1959; 1996) 所說，通常是不會呈現那些幽微的權力運作與說服究竟如何發生的。而這也正是本文藉由 Mario C. Vázquez 未出版的田野筆記，最能夠著力的面向。

Mario C.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共有兩個版本，從手寫到打字機謄寫，本文主要使用打字機所謄寫的版本。打字謄寫，意味著他在整理筆記的過程當中，也在重新組織行動的經驗。閱讀他的田野筆記，一方面就像是透過他的眼光，觀看了整個計畫的來龍去脈與動態，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位應用人類學者反覆咀嚼，當地人面對變遷時如何下決定？並捫心自問他帶給當地人的影響為何？為什麼有時候他可以成功說服當地人？有時卻又失敗？

這事實上也是 Sol Tax 提出，行動人類學如何貢獻於文化變遷理論的核心主旨。Tax 並不喜歡應用人類學的概念本身 (Bennett 1996; Stocking 2000)，但他對於康乃爾—秘魯計畫持正面評價，他認為該計畫「將該社群帶到一個可以自主行動的位置上」(Tax 1964: 256)，因此與他行動人類學的主張是相符的。筆者將 Mario C. Vázquez 重新放回分析框架中，呈現他如何在整個計畫過程中發揮影響力，與當地人互動、促使當地人選

擇新的農業生產與自我治理的方式。

但需要特別說明的是，Vázquez 本人的學術發表中，並未引用 Tax 作為他的理論框架；他並不是將 Sol Tax 的理論拿去應用在康乃爾—秘魯計畫當中，雖然他在計畫的執行過程中領會了一種關於社會文化變遷的模式，但最後這並沒有回饋到理論的書寫與發表當中，而是用行動去發展一套關於日後類似情境下可重複操作的「怎麼做」的知識。

#### （四）小結

Vázquez 在上述由鄉民研究、應用人類學與行動人類學共構的歷史舞臺上現身，進入維科斯莊園。他固然也關心鄉民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但我認為就是執行應用人類學計畫的性質，使他的田野互動模式與前述人類學者們不同。他不能只是一個旁觀的研究者，從旁描繪鄉民的性質與定義；他自己就是現代化的概念與技術進入維科斯莊園的媒介，而且正因為他的田野筆記記錄下他自己的行動，我們也才有辦法跳脫他本人受限於那個時代的現代化思考框架，從後見之明的角度來指出，那是一種只有「直接去做」才能形構成關於「怎麼做」的知識。

Roger Sanjek (1990b) 指出田野筆記是銜接事件與民族誌之間的橋樑，人類學者會在田野地一邊整理筆記，一邊形成下一階段的研究方向或提問，這是 Malinowski 所奠定的方法。民族誌作為一種人類學者對某社會文化的詮釋作品，是經由田野筆記書寫這種滾雪球般的過程所打造出來的；田野筆記書寫不是蒐集事實，而是隨著田野進展的過程滾動式發展。接下來經過學者的索引製作 (indexing) 功夫，他們通常依據理論將筆記中的細節分門別類，構成民族誌書寫的大綱 (Sanjek 1990a)。

Vázquez 的案例則挑戰了上述田野筆記與社會系統運作知識的連結，由於它發生在應用人類學計畫的場景之中，Vázquez 並未預設他是在客觀地觀察維科斯莊園的社會系統如何運作，他會記錄自己的行動與介入，在當地造成哪些效果與反應。透過這樣的田野工作與田野筆記所發展出來的知識，其實相當不同於一般的人類學知識，這是一種關乎實踐的知識——如何在具體的情境與脈絡中，判斷下一個行動選擇的全盤性理解。它的終點並不在民族誌的產出，並非要達到對於維科斯莊園的一種社會文化解釋，而是要達成推動現代化的目標。但是我們的確還是看到 Vázquez 透過打字整理田野筆記的痕跡，以及這個整理的過程，如何幫助他形成下一階段的行動方針。

在接下來的第四與第五節，筆者將對康乃爾—秘魯計畫與 Mario C. Vázquez 進行簡

短介紹，接著第六節將透過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一方面還原計畫進行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分析 Vázquez 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最後一個部分，則回到本文的核心，討論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如何呈現出行動中的鄉民形象。

#### 四、康乃爾—秘魯計畫及其歷史背景

康乃爾—秘魯計畫，是由紐約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贊助康乃爾大學，在全球六個不同區域，針對科技如何影響社會變遷進行研究，其中一個子計畫。這個由康乃爾大學人類學系教授 Allan Holmberg 所主持的子計畫，租下了距離秘魯首都利馬 321 公里遠的維科斯莊園，作為一個社會實驗室，在當中嘗試農業技術革新、教育、衛生、農民自治等改善計畫。1962 年計畫結束，康乃爾大學逐漸從維科斯莊園撤離時，莊園中的鄉民集資買下了莊園土地，並透過選舉產生議會，成為自己的主人。購地的資金多是他們在計畫過程中透過農業生產剩餘所累積，因而康乃爾—秘魯計畫也常被視為應用人類學史上著名的成功案例。

關於康乃爾—秘魯計畫的既有研究，大多圍繞著對於上述計畫結果該如何評價的問題而發展。本身就曾經參與計畫的學者，大多肯認計畫的正面影響力（Dobyns et al. 1971[1964]; Doughty 1981, 1987, 2011; Mangin 1979）。其中 Doughty（2011）的回顧，也以維科斯莊園後來的變化，支持著這樣的評價：由 Juan Velasco Alvarado 政權所推動的秘魯農業改革，在 1971 年時來到了維科斯莊園，當時人在當地的 Doughty 回憶，政府官員的高傲姿態，遭到維科斯鄉民領袖的反擊，領袖們主張維科斯莊園早在 1962 年就已經解決了土地問題，不需要再重組，現任政府能提供最好的幫助就是不要插手，這使得全國農業改革期間，維科斯莊園大體上維持著經濟與政治上的自主。1980 年代末起，維科斯莊園也被捲入了光明之路引發的內戰中，游擊隊曾表明要徵用兵力，遭到維科斯鄉民拒絕，反將游擊隊員扭送警局。根據 Doughty（ibid.）提供資訊，維科斯鄉民至少到 2011 年時還維持著自治選舉，持續運作診所、學校等基礎設施，人口與 1952 年計畫開始時相比增加三倍。

而對此提出質疑的學者，則指出維科斯莊園由政府徵收、農民接管的成果，實為當時秘魯社會氛圍所致，康乃爾大學的介入不見得是最主要原因，1945-1948 年間的 José Luis Bustamante 政權曾在國內掀起農業改革的希望，中間雖曾遭到 Manuel Odría 所率領的軍事政權（1948-1956 年）中斷，但 1956-1968 年間的幾位總統都曾嘗試有限度的農

業改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維科斯莊園鄉民的集資購地行動，對整個秘魯社會來說才可能是一種選項。這類研究也經常批判該計畫的現代化思維及家父長式主義（Mitchell 2011; Ross 2011）。第三種研究取徑則是不再侷限於評價計畫的成敗得失，而是將它視為一個歷史研究的主題、還原其脈絡（Himes 1981; Mayer 2011; Pribilsky 2011）。

筆者傾向跟隨第三種取徑，將康乃爾—秘魯計畫放在更廣大的歷史脈絡中理解。首先是關於冷戰的脈絡，特別是美國杜魯門總統於 1949 年就任演說時，所提到的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將針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技術援助，以降低其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可能。秘魯雖然並非冷戰熱點，且拉美各國進行土地改革的動力，雖不見得與所謂的共產主義直接相關，但確實是美國會密切觀察注意、甚至考慮是否援助或介入的對象。康乃爾—秘魯計畫橫跨 1951-1964 年間，可說見證了 1940 年代末、1950 年代初美國對於拉美土地改革的謹慎觀望，進而在 1959 年的古巴革命成功後，迫使美國轉向支持和平土地改革的立場。而康乃爾—秘魯計畫，就正巧成為和平改革土地所有制度的典範、美國在冷戰下的一塊金字招牌。

誠如上述第二類研究的批判，維科斯莊園並不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在山裡靜靜地等待康乃爾大學的到來；它處在當時秘魯社會變遷的浪潮中。1945-1948 年間的 Bustamente 政權，曾針對該區域的莊園推動現代化與工業化，興建水力發電廠（Klarén 1999），Bustamente 政權針對鄉村進行改革的行動並非自天外飛來一筆，而與 1940 年代不斷出現的農民訴求土地改革聲浪有關。相較於秘魯在太平洋沿岸的大莊園早已引進現代的農業與育種技術、投入更多資本以刺激產量；秘魯的高地區域面臨了產量停滯不前、大批人口外移至都市邊緣、傳統社會結構崩解的問題（Handelman 1975）。都市移民潮同時也提供了新的串聯網絡，使當時秘魯高地區域的農民工會組織與動員十分活躍，他們訴求重新分配土地。而也是這波逐漸漫進都市邊緣的移民浪潮，迫使原本鮮少關注鄉村問題的都市菁英，意識到問題迫在眉睫，進而有了土地改革的規劃（Collier 1976）。

事實上 Holmberg 原本也預計研究該水力發電廠將如何影響鄰近社區的農業生產與文化變遷，但正值計畫開端，秘魯就發生了 Odría 所領導的政變，該政權持續八年（1948-1956 年），加上接下來的 Manuel Prado 政權（1956-1962 年）也是靠攏地主階層的保守傾向，這樣的社會氛圍使得 Holmberg 必須調整計畫所要研究的問題——從觀察秘魯的社會鉅變，改為租下維科斯莊園，在扮演莊園主的角色設定之下，進行小規模的社會實驗。

## 五、跨國脈絡下的 Mario C. Vázquez

Holmberg 在 1948 年首次拜訪維科斯莊園，陪同他進行田野預調的其中一人，就是當時就讀聖馬可大學的學生 Mario C. Vázquez。Vázquez 出身於維科斯莊園地鄰近區域，對它經營不善的情形瞭若指掌，他提供 Holmberg 的資訊，引發了康乃爾大學用計畫經費租下維科斯莊園、進行社會改革實驗的狂想。從 1948 年起，Vázquez 就留在維科斯莊園，先進行為期兩年的基礎人口調查，並用這些材料書寫學士論文，於 1949 年取得聖馬可大學的民族學學位；並在 1950-1951 年間註冊於康乃爾大學的人類學碩士班，於 1955 年取得碩士學位 (Holmberg 1966)。除了碩士班課程期間曾赴美，他大部分時間都常駐維科斯莊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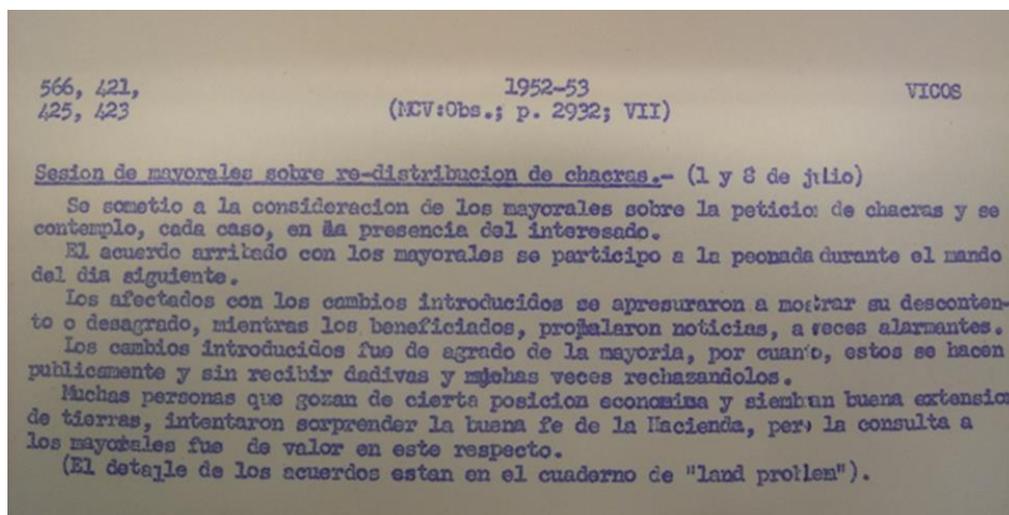


圖一 Mario C. Vázquez(左)訪問維科斯莊園農民(右)(資料來源：“Cornell-Peru Project researcher and a Vicos peasant,” RMC2004\_5231, 14\25\1529, Case G, Drawer 9, Allan R. Holmberg Collection on Peru, #14-25-1529.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ss:321627>,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1.)

Vázquez 出身秘魯 Huaraz 省的 Aquia 區，能自如地運用西班牙語與該區的蓋楚瓦（Quechua）方言，在中學時期離開家鄉赴首都利馬就讀，並且進入最負盛名的國立聖馬可大學。在秘魯的人群分類框架中，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來自鄉村的麥士蒂索（Mestizo）菁英，相較於成長在首都利馬的傳統克里奧（Creole）菁英，更能恰如其分地在都市與鄉村、現代與傳統文化之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進入大學，他選擇了 1946 年甫成立的民族學院，而不是拉丁美洲菁英慣常選擇的醫學、法學、新聞學等，足見他對於民族學當時在秘魯作為一個能解決鄉村發展問題有所認識。

民族學院成立的重要推手，也是秘魯知名的原住民主義者 Luis E. Valcárcel，曾在 1937-1941 年間訪問美國人類學界，他認為人類學反對種族主義的精神與拉美的原住民主義相似，而且是一種「能夠更科學地瞭解秘魯的選擇」（Valcárcel 1981: 319）。更為科學的理解方式，對他來說意味著能夠幫助政府針對鄉間發展的問題，做出更精準的規劃與立法。Mario C. Vázquez 是該學院第一批訓練出來的學生，在學院草創時期，無論是課程大綱設計、閱讀教材選擇、研究計畫合作與人員交換計畫，都和美國人類學界有著密切的聯繫。

## 六、田野筆記中的行動者



圖二 Mario C. Vázquez 以打字機整理過的田野筆記（資料來源：筆者攝於秘魯羅馬天主教大學圖書館（Colección Mario Vás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 （一）現代理性關係的建立

於 1948 年進駐維科斯莊園進行田野工作的 Mario C. Vázquez，一開始被當地人視為一般的麥士蒂索人，在過往經驗中，麥士蒂索人經常占他們便宜，從來不信守承諾。Vázquez 人類學式參與觀察的行為舉止，諸如和當地人同吃同住、一起工作（Vázquez 1949），並且帶小禮物給他們只為換取友誼（而不是索求更為明顯的利益）（Vázquez 1950），都使當地人慢慢意識到他與一般麥士蒂索人不同。當地人聽說了新租約的莊園主是來自美國的白皮膚外國人（gringo），紛紛議論著究竟會不會比過往的麥士蒂索莊園主們更好（Vázquez 1951）？Vázquez 初始所面對的就是當地人這種等著瞧的心態。

康乃爾—秘魯計畫不只是一要引入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技術，它也要在鄉民之間引進一種現代化的心態，根除鄉民過去與地主之間建立侍從主義式（clientelist）的恩庇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取而代之建立一種更為現代理性的關係（Holmberg 1960）。矛盾的是，康乃爾—秘魯計畫在規訓當地人進入這個現代理性的關係時，其實必須建立在當地人依然將計畫人員視為莊園主（patron），因此具備權威的前提之上。

建立現代理性關係的第一步，就是廢除過往鄉民每週需撥出三天時間無償為地主工作、以換取個別家戶土地使用權的不成文規定，將鄉民們所有的工作與服務都納入薪資計算（Vázquez 1951）。同時康乃爾—秘魯計畫也正式宣布，計畫人員不得收受任何來自鄉民的禮物（Vázquez 1952），這是過往較有資源的鄉民們用來爭取地主恩庇的慣常做法。新措施一出，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多半抱持肯定的態度，他們的負擔看似減輕了不少，但大多鄉民並未意識到，這同時也意味著他們無法再透過侍從主義式的恩庇關係，而比鄰人享有更多資源。

舉例來說，以往由於莊園主通常不住在莊園內、委由監工照管莊園內的大小事情，鄉民們偷竊或者撿拾莊園收成後散落的農產品，只要不是太明目張膽，通常監工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Lynch 1982）；但在康乃爾—秘魯計畫下，這一類的行為不再被允許。Vázquez 的田野筆記中寫道，一個年輕人偷竊莊園的馬鈴薯被發現了，他的教父趕緊跑來調停，要他跪下來並親吻 Vázquez 的手背以求原諒——這是傳統莊園主與鄉民之間一種慣習實踐。Vázquez 清楚地意識到這個舉動背後的意思，在於重新確認雙方不對等的恩庇關係，所以他拒絕了那位教父的提議，告訴年輕人只要口頭上承諾不再犯就足夠（Vázquez 1952）。過往莊園主—監工—鄉民之間的關係，重點並不在於規則是什麼，而是肯認誰才是握有權力的人；但康乃爾—秘魯計畫想建立一個無論是管理階層或者鄉民都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則。

檯面下的不對稱交換關係不再受到鼓勵；與此同時，一個正式的獎勵系統也必須成立。Vázquez 在田野筆記寫到，有一次他受邀到鄉民家中享用豐盛的午宴，席間這戶人家向他暗示明年是否可以多撥一些土地給他們使用，而他並未做出任何承諾（Vázquez 1953）。這並不是單一事件，Vázquez 在筆記中強調，每年重新分配個別家戶土地使用權，應該要建立一種更為公開公正的討論與決策機制，杜絕私下賄賂的習慣（Vázquez 1952-1953）。康乃爾—秘魯計畫更建立了一套公開獎勵的機制，在歲末年終時公開頒獎給全勤出席莊園工作的鄉民，並在所有鄉民面前贈與農具或者馬鈴薯（Vázquez 1952）。Vázquez 觀察到鄉民們對於這種公開表揚的方式相當不習慣，他們擔心鄰人的嫉妒與議論，因此不好意思上前領獎。

然而對於康乃爾—秘魯計畫人員而言，因扮演莊園主角色而具備的權威，還是相當好用，他們必須利用鄉民對於權威（表面上）的遵從來推動工作，例如要求他們增加莊園工作的出席率，並新增以出席率作為隔年土地使用權分配依據的規範。此外，即使康乃爾—秘魯計畫預計逐步將決策權力與衝突調停轉到當地領袖手中，計畫人員如 Vázquez 因著他的個人領袖魅力，在鄉民心目中，依然扮演了如過去的莊園主般重要的角色。

例如，在調查經常缺席莊園工作的鄉民 C 的狀況時，根據地方領袖提供的訊息，Vázquez 得知主要問題在於 C 分居已久的妻子與他的弟弟、侄兒間的土地使用衝突。在 C 久病無法獨自完成農事的狀況下，目前他大部分的土地暫由弟弟 A 及侄兒 S 協助耕作；但有小部分土地是 C 分居的妻子在耕作，以養育兩個年幼的孩子，但女性在莊園中是不具備土地使用權的。按常理來說，無法完成莊園工作義務者，會將工作傳承給長子，否則就要將土地與房屋歸還給莊園、重新分配，但 C 的案例較為複雜——他與妻子分居多年，且孩子尚年幼、無法獨力完成農事；他本人在生病的狀況下也依然有經濟需求；另一方面是他弟弟有自己的土地，而不該同時享有兩塊土地的使用權。Vázquez 對此提出了一個周到的解決方法：他提議在 C 過世以前，土地與房屋的使用權都仍屬於他，但未來終究會由他的長子繼承，在其子成年而得以繼承使用權之前，將由其分居的妻子教導養育（Vázquez 1952）。

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就是在這些與 Vázquez 的日常互動當中，逐漸體會這個來自美國的新莊園主——康乃爾—秘魯計畫—想要做什麼，而他們又該與這個新莊園主建立什麼新關係？而 Vázquez 本人也逐漸摸索出，像他這樣的一個外來者，會在鄉民之間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改變長久以來的積習？他推動應用人類學計畫，按下了一些改變的開

關，將過去恩庇關係中那種傾斜的、權力不對等的互惠往來給切斷；但如同 Sol Tax 所探問，重點在於人們面對變遷時，是如何琢磨手邊可得的各種選擇（Tax 1975）。

我們從 Vázquez 的筆記中得知，在觀念上，鄉民們是舉雙手贊成取消那些權力不對等的習慣；但實際情境發生時，他們依然第一時間就跪膝、親吻莊園主的手背請求原諒，也不敢在公開場合上前領獎。這些舉止當下的反射與遲疑，並不意味著觀念上的保守，而是他們必須在過去長久累積的互動模式所建立的脈絡下，觀察現在莊園主、鄰里親友的反應與行為，再以實際的行動嘗試現在最合適的作法。

## （二）新種薯計畫

類似的經驗也呈現在他推廣新種薯（New Seed Potato）的過程中，新種薯可說是康乃爾—秘魯計畫在維科斯莊園推動農業革新上的核心。莊園的鄉民們有自己慣常耕作的方式，從秋收後的留種、到春耕時的整地，包括除草施肥等日常農事，不太可能輕易讓像是 Vázquez 這種不諳農事的學者說服。Vázquez 在田野筆記中記載了鄉民們對此事的猶豫，也記載了他嘗試改變這個情況的過程。

康乃爾—秘魯計畫開始時，維科斯莊園正經歷一場由馬鈴薯枯萎病引發的飢荒，因此鄉民們不得不將原先預計留作隔年種薯的馬鈴薯拿出來食用。面對這個可預期的種薯短缺問題，Vázquez 向美洲糧食生產合作服務（Servicio Cooperativo Interamericano de Producción de Alimentos, SCIPA）的區域辦公室尋求建議，改良維科斯莊園的馬鈴薯生產，開啟接下來為期十年的馬鈴薯生產榮景（Lynch 1982）。SCIPA 提供給 Vázquez 的建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就是一組由綠色革命概念發展出來的套裝操作，包括了間距種植、新品種引入、化學肥料與殺蟲劑使用等。從 1952-1955 年間，Vázquez 共花了三個種植季的時間推廣，除了莊園所屬的土地外，估計有百分之七十二的個別家戶參與其中（ibid.）。

剛開始的時候，三百六十三戶裡面，只有十七戶自願參加，而且參加的這十七戶，並沒有完全按照標準流程來操作。一個關鍵的原因是鄉民們身邊並沒有充分的現金，向莊園購買標準流程所需的種薯、化肥、殺蟲劑等；此外，農業技術的學習是一種經驗性的過程，大部分的鄉民寧可先觀望看看再決定是否要改變。關於現金短缺的問題，康乃爾—秘魯計畫推出了平分制（mediania），也就是自願參加的家戶能夠獲得種薯、化肥、殺蟲劑的分配，最後收成的百分之五十歸莊園所有。

Vázquez 除了在正式場合公告周知平分制，他也開始私下與莊園中較為富有、有影響力的鄉民商談，說服他們加入新種薯計畫。私底下、面對面的商談，使他更能夠針對每個人不同的疑慮進一步澄清，而且談話的時候通常周圍也都還有親友鄰居，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宣傳管道（Vázquez 1952）。在後來的訪談中，Vázquez 也證實了，親友鄰居之間互通消息，對於新種薯計畫的開展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Vázquez 1953）。另一方面，除了較富有的鄉民外，Vázquez 也發現，當時受到馬鈴薯疫病衝擊最大、最底層的家戶，也較為願意主動參與新種薯計畫（ibid.）。

由於新種薯計畫是一個套裝的農業技術與觀念，鄉民願意參與只是第一步，後續還有許多必須密切溝通的事情。就拿間距種植來說，新種薯計畫要求農民將馬鈴薯以固定間距種植，以利灌溉，避免塊莖腐爛、土壤流失（ibid.）；另一方面，間距種植也讓化學肥料與殺蟲劑的施用更有效率。但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卻沒有輕易地接受這些指引，參與第一年計畫的鄉民們，有些抱怨這樣一來小偷就更容易竊走他們的種薯，也有人苦於家中沒有足夠的幫手整地，其他人則說這樣一來馬鈴薯無法從土壤中獲得足夠的水分（ibid.）。Vázquez 曾經親自調查抱怨種薯被偷走的案例，從鄰居的證詞與現場的腳印遺留，他認為很可能是這位鄉民自己所養的豬隻所造成（Vázquez 1952）。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殺蟲劑的施用，有些鄉民看過其他人的馬鈴薯在噴灑之後生病了，所以拒絕使用；其他的則用錯誤的方法，一下子就將分配到的劑量噴灑完畢，所以防治效果不彰；還有一些具備實驗精神的鄉民，自作主張將自家田地分成試驗組與對照組進行觀察（Vázquez 1953）。Vázquez 經常拜訪他們的田地，若是看到他們並未按照計畫指示的方法灌溉、施肥、噴藥，或甚至對他謊稱一切按照指示進行的狀況，他通常會先詢問原因，然後試圖進一步說服他們按照指示進行。維科斯莊園的農民都戲稱 Vázquez 有一台接收莊園各式消息的收音機，讓他對家家戶戶發生什麼事都瞭若指掌（ibid.）。

然而這種種的遊說與協商過程，都比不上 1953 上半年的第一季豐收來得有說服力，眼見鄰居親友成功的維科斯鄉民們，踴躍地自願參與下一季的新種薯計畫。如同 Nick Cullather（2004）指出，冷戰期間的發展專家們都承認，美國對外的發展援助經常必須透過創造視覺上的奇觀（spectacle）來說服第三世界的人民。在 1954 年的訪問當中，許多新成員向 Vázquez 坦承，他們加入的主要原因是看到大家都在做，而且顯然收成也不錯（Vázquez 1954）。有些人更談到來自家人與同儕的壓力，例如受訪者 M 就是在妻子的敦促下來表達參與的意願（ibid.）；受訪者 L 則說不想被別人嘲笑，他是因為新種

薯計畫的工作量太多，所以才畏畏縮縮、裹足不前 (ibid.)。Vázquez 在 1954 年的田野筆記中，記錄著這些新成員多半願意遵從新種薯計畫的套裝指引，因此他也逐漸減少了田間巡視的時間。

從新種薯計畫的經驗來看，鄉民是透過「行動」本身——而不是觀念——來領會「改變」的輪廓就更為清晰了：新種薯計畫在會議上宣達以後，他們開始在與親友鄰居的「閒話家常」中論及此事、「打聽」消息、「觀察」哪些人會先表態要加入；回到家後，他們又緊接著開始與家人「盤點」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與資本投入、投入與不投入又各有哪些獲得與損失；選擇投入的鄉民，有些「設計」了自己的實驗對照組，在實際行動中「確認」施用農藥、肥料將帶來什麼樣的效果，有些則是在 Vázquez「巡視」田間、「三令五申」之下，逐步「修正」至正確的施用方法；而第一年沒有加入的家戶，並沒有徹底放棄加入的可能性，他們「見證」了親友鄰居的豐收，再度回到家中「衡量」利弊得失，包括經濟上的，也包括社會聲望上的，然後再下定決心加入。

### (三) 借貸制度與商業化生產

除了在農業技術上的調整，康乃爾—秘魯計畫也同時想改變鄉民們對於收穫該如何安排的行為方式。整體來說，計畫希望引導維科斯鄉民們將農產品商業化，以利鄉民累積資本、改善生產效率。Vázquez 注意到，鄉民們習慣上會將收成中的一大部分透過互惠形式送出，其中最重要的形式為 minka，類似於換工的概念，鄉民們會將馬鈴薯分送給前來協助收成工作、出借農具的親友。在主要的收成日當天，主人家通常會準備豐盛的一餐宴請前來 minka 的親友；假設在這一年當中，主人家曾經向親友借貸過糧食，對方也會在這一天出現，拿取他們應該收回的部分。

除此之外，行有餘力者也多半會開放讓其他生活困苦的維科斯鄉民，以低廉的代價以物易物、換取馬鈴薯，甚至任他們撿拾 (kallapar) 收成過後散落在田中的馬鈴薯。鄉民們多半認為，別人有求於自己，是一種能力的展現，且若有一天換他們有求於人，也可以透過這樣的互惠網絡得利 (Vázquez 1953)。若單純以學術研究的眼光來看，這無疑地是一個互惠實踐的網絡，鄉民們在當中交換勞動力、維持糧食安全、進行財富重分配，同時也累積社會聲望。然而對於應用人類學者 Vázquez 而言，停留在理解與描述是不充足的，他必須一邊嘗試著推動商業化，一邊觀察鄉民們如何面對改變過程當中的種種不安與焦慮，特別是回應前來 minka 以及討債的親友時 (ibid.)。

的確有部分維科斯莊園的鄉民，會將馬鈴薯出售到市場上，有些是自願，也有些是透過所謂的平分制上繳莊園的部分進入市場。鄉民們需要現金來購買一些無法以物易物的商品，例如羊毛；也有些人的確會將收益再投資到農業生產上，購買農具、肥料、農藥，或雇用臨時勞動力。Vázquez 觀察到，鄉民們對於社群內部的互惠機制與對外的商業交涉，在原則上有著清楚的區隔 (ibid.)。鄉民們與麥士蒂索中間商交易時，會考量市場價格，也會依照比例原則，換言之，他們並非缺乏市場或資本的概念。但他也觀察到，互惠原則經常在最後一刻影響鄉民們的決定，當他們開始衡量此舉在自己的社會關係上造成的後果，最後決定出售的量往往比原本預計的少很多。

在這樣的觀察基礎之上，Vázquez 試圖進一步推動商業化與資本積累的概念，他首先著手改善的是莊園內的借貸制度。初始康乃爾—秘魯計畫設計了平分制，也就是由計畫借貸出去給鄉民的錢，回收時以鄉民售予市場之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十來計算。平分制受到部分鄉民們的歡迎，他們認為這比過往任何麥士蒂索人占盡便宜的手段，來得更為公平。有些人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來理解平分制，他們在履行守夜或者整理灌溉溝渠等公共義務時，也有平分香菸或者古柯葉的習慣 (ibid.)。

但也有人批評平分制，認為莊園僅提供種薯、肥料及農藥，但是鄉民們則是付出許多勞動力，從整地、育苗、鋤草、噴藥、灌溉、圍籬到收成，雙方的付出不成比例 (ibid.)。因此 Vázquez 在 1954 年又設計了新的借貸制度，莊園以低利率的方式提供鄉民種薯、肥料等，等農民收成後，他們可以選擇以現金或實物來償還，這當然是在鄉民間進一步推動對現金的需求。新制推動的第一年，大部分的人都選擇觀望，1955 年共計有七十二位借貸者；1956 年由於許多參與新種薯計畫的鄉民都已經有自己的現金來源，借貸人數降至三十五人 (Lynch 1982)。

後續，在 1956 年 10 月過後，康乃爾—秘魯計畫由主導轉變為協助角色，改由鄉民選舉代表決策莊園大小事，莊園逐漸轉型為合作社。隔年，他們就成立了內部的監督農業信貸 (Crédito agrícola supervisado, CAS)，接受 SCIPA 指導，向秘魯農業發展銀行 (Banco de Fomento Agropecuario del Perú) 申請貸款，提供莊園與鄰近社區的個別鄉民融資服務。鄉民們維持了莊園時期於地主土地上共同工作的模式，將這塊土地上產出的馬鈴薯投入市場販售，並以此收入來償還貸款 (Vázquez 1962)。

雖然這並不代表市場交換完全取代互惠機制，我們的確看到，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在衡量、選擇與行動的過程中更為熟悉貸款、資本、市場交換的操作模式。正如 Vázquez 所觀察，鄉民們並不是原先在觀念上就缺乏對資本邏輯與市場機制的理解；而是在評估

「行動」上的改變，將在他們所生活的人際網絡中激起多大的漣漪？

Vázquez 並沒有禁止他們透過互惠機制來累積社會聲望的慣常做法，而是搭配越來越多鄉民想要「加入」新種薯計畫、需要貸款來「購齊」新種薯、肥料與農藥的前提，來增加鄉民「進入」借貸制度的誘因。早期的平分制，並未偏離鄉民的互惠邏輯太遠，並以實物支付；但是在制度「施行」的過程中，部分鄉民「意識」到，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力並不符合互惠的比例原則，於是他們「要求」改變。新的低利貸款制度離互惠邏輯更遠，但較符合鄉民們在市場交換上的比例原則；等到莊園轉型為合作社後，也「沿用」了這樣的作法。

#### （四）新領導階層與代表選舉

雖然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彼此之間，仍被互惠的紐帶維繫著，但 Vázquez 也觀察到，這並不意味著他們能夠與彼此合作。名義上，所有的莊園土地皆屬於地主，地主有權利將所屬土地分配給鄉民使用，也有權利將使用權收回；在實際運作上，鄉民們只要持續盡他們對莊園的義務，通常都可以維持世襲的土地使用權，甚至能透過一些手段運作來獲取更大的土地。Vázquez 剛開始進入維科斯莊園時，就已經注意到鄉民之間的貧富差距（Vázquez 1949）；在新種薯的推廣過程中，他更意識到自己每天都在調停個別家戶間競爭所造成的日常衝突，像是鄰居畜養的動物踩進馬鈴薯田、爭奪灌溉水的優先使用權等（Vázquez 1953）。

Vázquez 發覺鄉民們會利用他們與康乃爾—秘魯計畫的關係密切、配合度高這點，作為在衝突中獲取優勢的利基。有些鄉民向他打探其他參與新種薯計畫農戶的狀況、在他面前告狀其他人如何亂用新種薯或肥料、宣稱自己比不參與的農戶更有優先灌溉權，甚至是將馬鈴薯故意種在世仇所蓄養的動物經常經過之地點，待事件真的爆發時，讓 Vázquez 來為他們「主持公道」，報一箭之仇（ibid.）。Vázquez 意識到這些情況後，就開始減少直接介入調停，但他也沒有明白地對眾人宣布此事，而是傾向讓鄉民們覺得他們可以透過參與計畫得到好處，以吸引更多人自願參加。

但另一方面，Vázquez 也認為家戶競爭不該無限制地被鼓勵，特別是關於鄉民們在意的土地使用權這一點。Vázquez 與諸多當時主張土地改革者的擔憂是相似的：競爭或許可以刺激個別家戶的農業產量，但如果競爭到最後將原本莊園的大範圍土地碎裂成更小單位，是否違背了規模經濟的理想？

為了鼓勵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維持群體工作的模式，康乃爾—秘魯計畫也朝培養在地領袖的方向進行。在計畫介入之前，除了莊園主以外，維科斯莊園還存在兩種密切相關的政治權力系統：mayorales 與 varayoc。所謂的 mayorales 是由莊園主從鄉民中選出、協助他監督莊園日常運作的管理階層；而 varayoc 則是鄉民之間的一種世俗—宗教等級制度（civil-religious hierarchy）下的領導者，成年已婚的男性成員在此等級制度中，須輪流服務於社群事務（如節慶儀式）、逐步累積社會聲望、財富與影響力。通常莊園主所指派的 mayorales，也同時是重要的 varayoc（Lynch 1982）。雖然是同一批人，但鄉民們卻清楚區分這兩種邏輯：mayorales 的權力來源是莊園主，它是一種由上而下、較不具協商空間的權力型態；而 varayoc 的權力則來自與其他鄉民的互惠交換，它比較像是一種社會聲望，並非能夠將自我意志強加於他人的型態。

康乃爾—秘魯計畫開始的時候依然維持 mayorales 制度，作為計畫與鄉民之間的溝通橋樑，但也逐步限縮他們的權力，讓原本單純用來宣布及指派工作的會議——mandos，逐漸轉型為雙向溝通的形式，徵詢鄉民對於計畫的意見。康乃爾—秘魯計畫每週一到週三都有固定的三種會議：第一種會議是計畫人員內部的；第二種是計畫人員與 mayorales 之間的，用以徵詢 mayorales 對於新工作推動的意見（Vázquez 1951）；第三種則是 mandos，計畫人員多利用這個場合宣布新的決議，同時聽取鄉民們的意見。Vázquez 曾描述，鄉民們在 mandos 中，經常保持沉默，或者透過發出聲響來表示滿意或者抗議，計畫人員就會再依照當時的情況，決定是否要修正，或進一步解釋他們的規劃。要說 mandos 成為民主自治的場域恐怕有點過頭，但它絕對是計畫人員與鄉民之間討價還價、彼此說服或讓步的場合。

除了允許鄉民們在公開會議中針對工作討價還價、逐步形成群體共識以外，計畫也打算培養更具自主性的領導階層。首先，是請 mayorales 在他們其中推舉出兩位領袖，這項提案讓 mayorales 們十分困惑，因為他們對自己身分的理解僅是作為莊園主權力的中介者，若是論及在他們之中選拔領袖的問題，當然也是莊園主的權力。Vázquez 在筆記當中寫下這個現象，同時他也進一步對 mayorales 解釋了計畫的想法。接下來 mayorales 之間開始交換意見，他們最後推舉出了兩位領袖，是當中年紀最長、經驗最豐富的成員（ibid.）。計畫雖然傾向鼓勵年輕一代的鄉民競逐領導資格，但當下也尊重 mayorales 們的決定。

Mayorales 自認為他們純粹只是莊園主權力的中介者、而非對民眾直接負起責任的領袖一事，讓康乃爾—秘魯計畫在推動革新時遇到不少麻煩。例如，計畫試圖透過

mayorales 推動禁止兒童工作時，mayorales 們並不對此表達意見，只是要求計畫人員在 mandos 中當眾宣布，讓鄉民們知道這是來自「莊園主」——莊園中終極權力來源——的命令 (ibid.)。唯有如此，鄉民們才有可能聽從他們的監督。換言之，要透過這樣的 mayorales 體系逐步推動自治，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

另外，計畫對於鄉民們採取可商量、討價還價的姿態，也某種程度動搖了它作為「莊園主」的絕對權威，連帶影響鄉民們對於 mayorales 的態度。有 mayorales 抱怨，鄉民們現在既然不怕新「莊園主」了，自然也沒有必要聽 mayorales 所傳達的命令 (Vázquez 1952)。因此當計畫人員質問他們為何不積極推動指定工作項目時，這些 mayorales 回應，他們沒有懈怠，本身也願意配合計畫，問題在於來自「莊園主」的權威已經不足以讓他們做這些事。換言之，維科斯莊園原本的權力與控制結構正在鬆動，而康乃爾—秘魯計畫勢必得建立一批新的領導階層來推動工作。

計畫的理想是培育一批較年輕、具備西班牙 / 蓋楚瓦雙語能力的領袖，讓維科斯莊園即便在計畫結束之後，仍能具備持續現代化的動力。為達成這個目標，計畫首先鼓勵年輕男性服義務兵役，這是他們能夠學到西班牙語、認識外面世界的最佳管道。以往莊園主為了保留年輕男性的勞動力，經常幫助他們逃避兵役，在徵召日把他們藏起來，或甚至賄賂低階軍官睜隻眼閉隻眼、放過他們。

Vázquez 挨家挨戶地拜訪家中有屆役齡男性的家庭，試圖說服他們兵役的積極價值。剛開始，多數年輕男性如喪考妣般地接受他們的命運，他們的父母長輩更是對 Vázquez 多所埋怨，特別是如果他們已經準備好賄款的情況下 (ibid.)。但大部分的役齡男性還是在體檢日那天現身，接受了 Vázquez 的建議。而第一批出外服兵役後退伍歸鄉者，也可以說就是日後維科斯莊園年輕領袖的骨幹。

1956 年，康乃爾—秘魯計畫受紐約卡內基基金會資助的第一階段即將結束，沒有人知道基金會是否會繼續資助下一階段；而如果未能受到第二階段補助，維科斯莊園很可能再回到計畫開始前的狀態，由某個外來的莊園主承租、中斷計畫期間的各式革新。人在美國的康乃爾大學教授 Allan Holmberg 積極奔走尋求資助單位時，留守在秘魯維科斯莊園的 Mario C. Vázquez 則開始著手進行推動鄉民形成共識、爭取自治與土地權的工作。

Mario C. Vázquez 在這段期間與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密切互動，尋求鄉民集資、租下莊園，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的機會。筆記當中提到，1956 年 5 月 2 日，他在會議中宣布

將挨家挨戶拜訪每個家庭、尋求共識，當時 *mayorales* 還提出質疑，為什麼不直接在 *mandos* 上提議？Vázquez 解釋，那是因為鄉民們一般傾向不在大型會議上表達真正的想法（Vázquez 1956）。

Vázquez 在 5 月 3 日到 9 日之間，密集拜訪家戶，和他們進行小型會議、討論集資計畫。Vázquez 自陳，他通常會以問句開頭，詢問鄉民們是否知道誰才是莊園真正的主、而為什麼又會有外來莊園主來租地營運？從鄉民們的回覆他觀察到，許多鄉民都意識到，外來莊園主租地營運，就是為了要透過他們的勞動力來牟利。這個時候他就會提議，鄉民們何不乾脆集資、集體將莊園的經營權給租下來？在其他的家戶會議中，他則要鄉民們比較康乃爾—秘魯計畫與先前莊園主經營上的差異，並要他們想一想，維科斯莊園的未來應該要走向哪一邊？

鄉民們對於這些問題有不同的反應，而且 Vázquez 發現，他們已經事先想過了。有一些家戶很快就同意了集資的提議，其他的則說他們拿不出這筆錢，或者反問如果大家平常使用的土地大小不一、經濟能力不同，是否有需要每家都出一樣多的錢。鄉民們事前就曾彼此交換想法，有一些原本持反對意見的家戶，則被支持的家戶給說服了（*ibid.*）。大多數抱持疑慮者的理由，除了經濟能力所帶來的限制，還有對於把錢交給某個內部成員的不信任感。早在 1946 年，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就曾經集資過一次，但最後，負責收錢的成員卻捲款潛逃。因此有許多家戶表示，與其把錢交給某個內部成員來收，他們寧可信任 Vázquez。

經過將近一週的家戶拜訪，1956 年 5 月 9 日，Vázquez 評估時機已經成熟，能夠在 *mandos* 上正式宣布此決議。這個共識顯然不是只靠著 Vázquez 一人去動員、操作的，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還清楚記得十年前的失敗經驗，但是新種薯計畫帶來了一波經濟上的榮景，使他們有信心考慮再嘗試一次的可能性，而且他們早在 Vázquez 的家戶拜訪前就已經開始討論這件事。

另一方面，Vázquez 也思量著家訪過程中所觀察到的那些疑慮，該如何克服？首先，1946 年的失敗經驗，使得鄉民們無法信任傳統領導階層、將集資的任務託付給他們；其次，鄉民的家戶之間的確存在貧富差距，如果不經過統整規劃，鄉民們租下土地之後很可能分割成更小單位、各行其是，規模經濟的優勢將不復見；最後，Vázquez 也觀察到鄉民之間，似乎在競爭這次集資行動的領導位置（*ibid.*）。他評估，讓鄉民們舉行內部選舉、推動自治的時機，已經來臨。

同年 10 月 16 日，維科斯莊園以分區為單位，投票選舉各區代表，莊園共有十個分區，每區產生兩名代表。這個新選舉出來的代表團，將取代莊園主與 *mayorales* 所構成的舊有決策體系 (Lynch 1982)。Vázquez 觀察投票結果後歸納出，過去以富裕長者為主幹的領導階層開始殞落，他們獲得的票數不如年輕世代領袖 (Vázquez 1956)。在 10 月 17 日舉行的新代表大會中，一位年長代表更表示，自己不合適擔任前往首都利馬會見相關部會首長、訴求政府徵收莊園土地的代表，應該由能以西班牙文溝通的年輕人擔任 (ibid.)。年輕一代的領袖固然尊重年長世代，但領導階層的組成，正如康乃爾—秘魯計畫所期待的，產生了改變。同年 12 月 11 日，傳來政府同意徵收維科斯莊園的好消息，但土地正式轉移到鄉民們組織的合作社手上，則要等到 1962 年。

先前的世俗—宗教等級制度，反映出過去鄉民將大部分收成用於互惠交換以累積社會聲望的趨勢。具體來說，在維科斯鄉民的社群內部，想要沿著世俗—宗教等級制度往上晉升，就必須能表現出慷慨與眾人分享酒食、贊助宗教慶典的能耐，而在這點上，年長通常是一個有利的因素，因為年長者累積財富的時間較長。因此，外來租地的莊園主，需要找到對的 *mayorales* 來協助他們管理鄉民時，通常會找年長且富有的 *varayoc* 擔任。

那麼，維科斯莊園的鄉民們是如何在「行動」中接受新的領導階層呢？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傳統領導階層在日常生活中的鬆動，原本由上而下的 *mandos*，變得可以「討價還價」，鄉民們「不再唯命是從」於 *mayorales*；*mayorales* 也「意識」到，他們過去結合了社會聲望與權力的優勢地位不再，以至於在往後推舉代表的過程中他們決定「謙讓」年輕領導。另一方面，Vázquez「現身」在役齡男子的家中，他帶著代表莊園主的權威，或許還有來自維科斯鄉民們逐漸累積的信任，「說服」了「半推半就」的役齡男子及其家人，勉為其難地「接受」他們的義務、進入必須「學習」西班牙語的服役環境，待他們役畢「歸來」時，身上就「帶有」與外界接軌的能力。

1956 年，在集資行動的決議上，Vázquez 選擇不在工作分配會議上討論，而是打算沿用新種薯計畫開始時的家戶拜訪、口耳相傳策略；但他在挨家挨戶「拜訪」的過程中，發現自己其實「捲入」了鄉民們原本就已經「展開」的對話。他很可能不是這場對話的啟動者，但他的確在對話過程中被鄉民們「賦予」了角色——一個可以信賴的圈外人；他同時也在鄉民的耳語中「聽出」了暗潮湧動的「競爭」，「意識」到自己不是可以為鄉民代言的人，他可以做的是協助「催生」維科斯莊園的第一場選舉，並「見證」領導階層的世代交替。

## 七、結論

本文以 Mario C. Vázquez 田野筆記為主要材料，重新梳理了康乃爾—秘魯計畫的實踐過程，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冷戰期間的應用人類學敘事。這個新的敘事當中，不再只有學者與國際組織官員，或者非現代化即革命的二元對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第三世界人類學者，用他時而進步、時而權威的行動與嘗試，在維科斯莊園的鄉民間激起漣漪，他會觀察那些漣漪的波紋，再決定下一次要投多大的石塊。他並不是單純站在陸地上觀察水面的人，他自己也站在水中、被漣漪波及。他捲入了維科斯鄉民在馬鈴薯疫病後，重新試圖追求經濟復甦、政治自主的浪潮裡。正如 Sol Tax 對行動人類學的主張，人類學者 Vázquez 事實上是與維科斯鄉民處在一個共同行動的過程中：他試圖去理解，鄉民在面對變遷時，如何琢磨手邊可行的選項、可用的資源後採取行動。

他最終或許沒有完成行動人類學的既定目標——建構文化變遷的理論——他與計畫相關的學術發表，僅停留在說明計畫成果的階段，並未進一步理論化（Holmberg, Dobyms, and Vázquez 1961）——但他確實是用這樣的方式運作著康乃爾—秘魯計畫。如果我們只看 Vázquez 學術發表的內容，康乃爾—秘魯計畫無疑是冷戰的一環。他主張維科斯鄉民們經歷了「和平」現代化的過程，要對照的其實是拉丁美洲「革命」必然論。然而，如果我們將此應用人類學計畫當作一個歷史研究對象，同時，將人類學者與鄉民放在同一個歷史舞臺上，透過 Vázquez 的田野筆記，我們看到文化變遷發生在雙方互相捲動的過程當中。鄉民的改變，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質上是保守的、創新的，或甚至是革命的，而是基於雙方在過程中以行動為對方切下的開關。就如同西洋棋比賽中，棋手每下完一步，就會按下棋鐘，開啟對手的下一著。

如同文獻回顧所提到，Lisa Peattie 在 1957 年就已經意識到，應用人類學計畫其實累積了許多有潛力的材料，能夠進一步理論化「文化變遷是如何發生？」，但是人類學者很少去做這樣的嘗試，所以它無法進入以理論發展為主軸的人類學「正史」。一方面，追求人類學理論的突破，通常不是應用計畫出資者設定的目標，因此也很少是人類學者擺在優先順序的工作。執行應用人類學計畫學者的日常，多半都與尋找經費、說服當地人、解決日常衝突、完成具體目標、書寫計畫經費核銷所需報告書有關。另一方面，Peattie 也指出關鍵恐怕還是在於，人類學者很少把自己放回分析的框架裡，以抽象的方式思考自己對當地人造成哪些影響？他們或許不諱言計畫對於當地生活的改變，但是分析的框架卻很少涉及學者個人行動，包括那些幽微的說服與權力關係。這恐怕還是涉及人類學在 1980 年代的文化轉向（cultural turn）以前，仍無法跳脫科學必須是客觀的、研究者

不會現身在自己的理論框架中，這樣的立場。

回到 George Stocking 對於豐富冷戰期間人類學史的呼籲，本文以一個應用人類學計畫未發表的田野筆記為史料，想要呈現的不只是「當時的行動紀錄如何具有建構文化變遷理論的潛力」，更希望能貢獻於我們對當時應用人類學、行動人類學的歷史認識。它們不再只是服務於冷戰、引發學術倫理爭議的影子人類學，這些實際存在於歷史當中的行動者，在學院以外的世界，嘗試了一些可能引發改變的行動。這些行動的過程本身，也讓我們更能理解當時研究者所面對的時代大哉問——現代化影響下的變遷是不可避免的嗎？究竟什麼是觸發變遷的關鍵？不同的人群會以什麼樣的方式改變？這些提問，恐怕到今日都還與我們同在。

在維科斯鄉民們成功取得土地、組織合作社來運行後，鄰近區域有許多原住民社群也向秘魯政府訴求能夠仿效維科斯案例，讓他們做自己耕種的土地的主人。Vázquez 也受秘魯政府委託，到這些地區去了解現況、評估土地徵收的可能性。Vázquez 運用了他在計畫中生產的這一類實踐知識，評估出維科斯案例的成功事實上有許多條件支持，如果政府無法對鄰近社群提供同等的支持條件，那麼徵收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只是一個開端，而不見得會有好的結果（Vázquez and Contreras 1958）。

雖然 Vázquez 日後將在秘魯 1968 年的農業改革中擔當重責大任，他在秘魯學術界的影響力並不大：基於當時拉丁美洲普遍將與美國相關的現代化計畫視為帝國主義的延伸，除了曾經參與過計畫的學者外，當時的秘魯社會科學學者與關懷社會改革的知識分子，多半不願提起康乃爾—秘魯計畫，而選擇了其他介入社會改革的取徑。

在此我想以 Vázquez 與一位秘魯共產黨—光明之路（Partido Comunista del Perú-Sendero Luminoso）之重要成員——農藝學者 Antonio Díaz Martínez 的例子對比，來凸顯當時關心秘魯農業改革的知識分子，如何選擇不同的實踐道路。光明之路於 1969 年在安地斯山區的阿亞庫喬區（Ayacucho）正式成立，初始，大多數秘魯人僅將它視為 1960 年代拉丁美洲大學普遍流行左翼思潮的一種表徵；未料它的游擊隊竟逐漸在安地斯山區茁壯，並將秘魯社會捲進一場死亡總數達七萬多人的內戰，直到 1992 年其領導人阿維馬埃爾·古斯曼（Manuel Rubén Abimael Guzmán Reynoso）被捕入獄，這場長達十多年的內戰才逐漸落幕。對於光明之路興起的原因，其中一個經常被提起的理由即是秘魯長期以來農業改革並未能符合農民需求所致。

身處於秘魯社會期盼農業改革的政治氛圍中，Vázquez 在 1940 年代末開始進入維

科斯莊園，他在 1950 年代末陪伴維科斯鄉民集資購地、地方自治選舉的正面經驗，使他對於「在專家學者陪伴下進行的農業改革」帶有信心，甚至在 1968 年的農業改革中擔任農業部副部長。同時代的 Díaz Martínez，則獲得與 Vázquez 完全不同的經驗：他於 1950 年代末從農業學校畢業後，曾投入 Manuel Prado 政權保守且有限的農業改革行動，感到十分失望；他在 1960 年代下半葉來到光明之路的起源地——瓦曼加國立聖·克里斯托瓦爾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Cristóbal de Huamanga）執教，當時秘魯大學普遍受到左翼思潮影響，而瓦曼加大學又以毛主義路線的共產黨派別較為興盛。Díaz Martínez 在 1965-1969 年間，都跟學生在學校附近的農村進行田野調查，見證 1968 年農業改革正要大規模執行的期間，同時他也關注瓦曼加大學買下兩個鄰近莊園作為農業改革實驗站的成效，但他從這些經驗中得到的不是信心，而是對於政府改革的幻滅（Harding 1988）。這些經驗更加確立了他對於武裝革命的想法，認為唯有透過翻轉整個社會的權力結構，農民才能真正得到福祉，他的作品也成為光明之路初期重要的理論依據。Vázquez 和 Díaz Martínez 在同一種社會氛圍下，因為兩人完全不同的經驗，最後選擇不同路線來實踐理想。

在人類學甚至是整個社會科學的領域，無法理論化、抽象化的知識，大多扮演一種為理論提供案例的次要角色；即便在 1980 年代以後，學者們也致力發展關於「人如何實踐」的理論，試圖賦予「實踐」在學術研究上的重要位置，但依然是以理論作為知識發展的終極目標。Vázquez 提醒了我們，知識的類型恐怕不僅只有抽象化這個層次，知識也是人類用以判斷實際情境的一種全盤性理解。

## 謝辭

本文改寫自作者的博士論文 *The Answer was Cooperative: How Anthropologists in Peru Redefined the “National Problem,” 1948-1975* 的第二章部分內容，特別是以田野筆記為史料、重建康乃爾—秘魯計畫推動過程的小節，是在博士論文书寫階段完成；將這段過程重新放回人類學史脈絡中探討，則是改寫過程中新發展的部分。本文前身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記憶的多元探索」工作坊（臺北南港，2020 年 7 月），以“Fieldnotes and the Making of ‘Peasant’ Image - The Case of Peruvian Applied Anthropologist Mario Vázquez”為題發表，感謝評論人蔣竹山教授建議筆者改以中文發表，觸及更多中文世界讀者。本文改寫過程中，筆者最為感謝林開世教授提供的回饋與建議，以及他在「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學術研習營——人類學與社會科學的發展」系列講座中給予

筆者的啟發。更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與修改建議，使本文在表達上能更為清楚。

## 參考書目

Bennett, John W.

1959 Introduction: Planned Change in Perspective. *Human Organization* 18(1): 2-4.  
DOI: 10.17730/humo.18.1.32677206100u1395

1996 Applied and Action Anthropology: Ideological and Conceptual Aspects. *Current Anthropology* 37(1): S23-S53. DOI: 10.1086/204461

Chu, Ying-ying

2016 The Answer was Cooperative: How Anthropologists in Peru Redefined the “National Problem,” 1948-1975.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Histor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Collier, David

1976 *Squatters and Oligarchs: Authoritarian Rule and Policy Change in Peru*.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1955-1962 “Cornell-Peru Project researcher and a Vicos peasant,” RMC2004\_5231, 14\25\1529, Case G, Drawer 9, Allan R. Holmberg Collection on Peru, #14-25-1529. Division of Rare and Manuscript Collections.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s://digital.library.cornell.edu/catalog/ss:321627>,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1.

Cullather, Nick

2000 Development? It’s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24(4): 641-653.  
DOI: 10.1111/0145-2096.00242

2004 Miracles of Modernization: The Green Revolution and the Apotheosis of Technology. *Diplomatic History* 28(2): 227-254. DOI: 10.1111/j.1467-

7709.2004.00407.x

Dobyns, Henry F., Paul L. Doughty, and Harold D. Lasswell, eds.

1971[1964] Peasants, Power, and Applied Social Change: Vicos as a Model.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Doughty, Paul L.

1987 Against the Odds: Collaboration and Development at Vicos.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Social Change: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Action*. Donald D. Stull and Jean J. Schensul, eds. Pp. 129-157. New York: Routledge.

DOI: 10.4324/9780429040573-9

1987 Vicos: Success, Rejection, and Rediscovery of a Classic Program. *In Applied Anthropology in America*. Elizabeth M. Eddy and William L. Patridge, eds. Pp. 433-45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I: 10.7312/eddy90380-020

2011 Anthropological Journeys: Vicos and the Callejón de Huaylas, 1948-2006. *In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eds. Pp. 51-78. Lanham, MD: AltaMira.

Engerman, David

2003 Review: Rethinking Cold War Universitie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5(3): 80-95. DOI: 10.1162/152039703322286782

2007 Bernath Lectur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 *Diplomatic History* 31(4): 599-622.

DOI: 10.1111/j.1467-7709.2007.00655.x

Engerman, David, ed.

2003 Staging Growth: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 Cold War.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Foster, George M.

1965 Peasant Society and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2): 293-315. DOI: 10.1525/aa.1965.67.2.02a00010

1969 Applied Anthropology.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Gilman, Nils

- 2003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andelman, Howard

- 1975 *Struggle in the Andes: Peasant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Peru*.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OI: 10.7560/775138

Harding, Colin

- 1988 Antonio Díaz Martínez and the Ideology of Sendero Luminoso.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7(1): 65-73. DOI: 10.2307/3338440

Hewitt de Alcántara, Cynthia

- 1984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Rural Mexico*.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1315181615

Himes, James

- 1981 The Impact in Peru of the Vicos Project.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A Research Annual* 4: 141-213.

Hobsbawm, Eric J.

- 1971[1959]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Holmberg, Allan R.

- 1960 Changing Community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Peru: A Case Study in Guided Change. *In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oday: Its Implications for United States Policy*. Richard N. Adams, John P. Gillin, and Oscar Lewis, et al. Pp. 63-107.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66 *Vicos: Método y Práctica de Antropología Aplicada*. Lima: Editorial Estudios Andinos.

Holmberg, Allan R., Henry F. Dobyns, and Mario C. Vázquez

- 1961 Methods for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Change.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34(2): 37-46. DOI: 10.2307/3317068

Issac, Joel

- 2007 The Human Sciences in Cold War America. *The Historical Journal* 50(3): 725-746.  
DOI: 10.1017/S0018246X07006334

Klarén, Peter F.

- 1999 *Peru: Society and Nationhood in the And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pp, Michael

- 1995 The Rise and Fall of Puerto Rico as a Social Laboratory, 1945-1965.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9(2): 169-199. DOI: 10.2307/1171509

Latham, Michael E.

- 2000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Lewis, Oscar

- 1951 *Life in a Mexican Village: Tepoztlán Restudied*.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59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New York: Basic Books.

Lynch, Barbara

- 1982 The Vicos Experiment: A Study of the Impacts of the Cornell-Peru Project in a Highland Community.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pecial Study No. 7, [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AJ616.pdf](http://pdf.usaid.gov/pdf_docs/PNAAJ616.pdf),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1.

Mangin, William

- 1979 Thoughts on Twenty-Four Years of Work in Perú: The Vicos Project and Me. *In* Long-Term Field Research in Social Anthropology. Elizabeth Colson, George M. Foster, Thayer Scudder, and Robert V. Kemper, eds. Pp. 65-8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Mayer, Enrique

- 2011 Vicos as a Model: A Retrospective. *In*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eds. Pp. 163-192. Lanham, MD: AltaMira.

Mitchell, William

- 2011 Anthropological Hope and Social Reality: Cornell's Vicos Project Reexamined. *In*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eds. Pp. 81-101. Lanham, MD: AltaMira.

Peace, William J., and David H. Price

- 2001 The Cold War Context of the FBI's Investigation of Leslie A. Whit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3(1): 164-167. DOI: 10.1525/aa.2001.103.1.164

Peattie, Lisa

- 1958 Interventionism and Applied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17(1): 4-8. DOI: 10.17730/humo.17.1.660q215106102x21

Pribilsky, Jason

- 2011 Modernizing Peru: Negotiating Indigenismo, Science, and the "Indian Problem" in the Cornell-Peru Project. *In*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eds. Pp. 103-127. Lanham, MD: AltaMira.

Price, David H.

- 2001 Fear and Loathing in the Soviet Union: Roy Barton and the NKVD.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Newsletter* 28(2): 3-8.
- 2002a Lessons from Second World War Anthropology: Peripheral, Persuasive and Ignored Contributions. *Anthropology Today* 18(3): 14-20.  
DOI: 10.1111/1467-8322.00120
- 2002b Past Wars, Present Dangers, Future Anthropologies. *Anthropology Today* 18(1): 3-5. DOI: 10.1111/1467-8322.00097
- 2004 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McCarthyism and the FBI's Persecution of Activist Anthropologist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215/9780822385684

- 2005 America the Ambivalent: Quietly Selling Anthropology to the CIA. *Anthropology Today* 21(6): 1-2. DOI: 10.1111/j.1467-8322.2005.00391.x
- 2007 Buying a Piece of Anthropology Part 1: Human Ecology and Unwitting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for the CIA. *Anthropology Today* 23(3): 8-13. DOI: 10.1111/j.1467-8322.2007.00510.x
- 2008 *Archaeological Intelligence: The Use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2011 How the CIA and Pentagon Harnesse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Cold War with Little Critical Notice.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67(3): 333-356. DOI: 10.3998/jar.0521004.0067.302
- 2016 *Cold War Anthropology: The CIA, the Pentagon, and the Growth of Dual Use Anthrop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Ross, Eric

- 2011 Reflections on Vicos: Anthropology, the Cold War, and the Idea of Peasant Conservatism. *In Vicos and Beyond: A Half Century of Applying Anthropology in Peru*. Tom Greaves, Ralph Bolton, and Florencia Zapata, eds. Pp. 129-161. Lanham, MD: AltaMira.

Rubinstein, Robert A.

- 1986 Reflections on Action Anthropology: Some Developmental Dynamics of an Anthropological Tradition. *Human Organization* 45(3): 270-279. DOI: 10.17730/humo.45.3.j0r1w186w2162140
- 2018 Action Anthropology. *In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Hilary Callan, ed., Pp. 21-27.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Ltd. DOI: 10.1002/9781118924396.wbiea2230

Rubinstein, Robert A., ed.

- 2002[1991] *Doing Fieldwork: Th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Redfield and Sol Tax*.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anjek, Roger

1990a On Ethnographic Validity. *In*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Roger Sanjek, ed., Pp. 385-41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I: 10.7591/9781501711954-017

1990b The Secret Life of Fieldnotes. *In* *Field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Roger Sanjek, ed., Pp. 187-27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I: 10.7591/9781501711954-009

Schultz, Theodore

1964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lverman, Sydel

2011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Modern Societies in the 1940s. *Identities* 18(3): 185-193. DOI: 10.1080/1070289X.2011.635280

Steward, Julian H.

1956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tocking, Jr., George W.

2000 "Do Good, Young Man": Sol Tax and the World Mission of Liberal Democratic Anthropology. *In* *Excluded Ancestors, Inventible Traditions: Essays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Richard Handler, ed., Pp. 171-2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Glimpses into My Own Black Box: An Exercise in Self-Deconstruc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Tax, Sol

1953 Penny Capitalism: A Guatemalan Indian Econom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No. 16.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4 The Use of Anthropology. *In* *Horizons of Anthropology*. Sol Tax, ed., Pp. 248-258.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Action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6(4): 514-517.

DOI: 10.1086/201616

1988 Pride and Puzzlement: A Retro-introspective Record of 60 Years of Anthropolog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7:1-21.

DOI: 10.1146/annurev.an.17.100188.000245

Valcárcel, Luis E.

1981 *Memorias*. José Matos Mar, José Deustua C., and José Luis Rénique, eds. Lima: IEP.

Vázquez, Mario C.

1949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0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1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2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2-1953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3 Interview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4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56 Fieldnotes, Colección Mario Vázquez, Colecciones Especiales, Biblioteca de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1962 Cambios socio-económicos en una hacienda andina del Perú. *América Indígena* 22(4): 297-312.

Vázquez, Mario, and J. Hugo Contreras

1958 Informe Lauramarca. MN/ALEV IIP 021, Archivo Luis E. Valcárcel, Biblioteca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Perú.

Wax, Dustin M.

2008 Introduction. *In Anthropology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 The Influence of Foundations, McCarthyism and the CIA*. Dustin M. Wax, ed., Pp. 1-16. London: Pluto Press. DOI: 10.2307/j.ctt18fscx8.4

Wolf, Eric R.

1966 *Peasants*. London: Prentice-Hall, Inc.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